

本期专题·教育公平

- 02 教育公平是永恒主题
- 03 刘瑜：如何最大程度地确保教育公平
从美国教育平权谈起
- 06 吴德刚：从机制上保证教育公平

政坛经纬

- 08 “前些年求升迁，近几年求稳定”
“迷信”官员迷什么、信什么

经济纵横

- 11 周其仁：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和下一程

人物春秋

- 13 钱钟书与“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的交往

文化漫步

- 15 大师离去后，他们的藏书去了哪儿

历史深处

- 18 鲁迅去世，蒋介石有没有送花圈

悦读时光

- 封三 列宁说“不要过分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二）

编者按：每年六月，高考、中考和小学生如何进入重点小学读书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今年的5月，因高考跨省调配计划，引发江苏、湖北诸多考生和家长的不满，互联网上一度众声喧哗，矛头直指教育公平问题。中国统计信息中心舆情调查显示，媒体评论主要围绕教育公平、教育体制、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教育经费几个方面展开，其中教育公平引发的讨论所占比例最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好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为多数人提供同等机会同等优质服务的教育。但是这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却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教育显失公平，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最大的障碍，是当前大环境中一个最不和谐的音符。它的存在，已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重视，不少人开始大声疾呼：“建设和谐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消除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

有权威专家认为，目前的国民教育显失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国家把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向大中城市，尤其是京津沪地区。大中城市占有国家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人文环境，而广大的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却常常被遗忘，师资匮乏，国家补助也往往是“杯水车薪”。二是城乡差别、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如城市里的孩子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却没有实现义务教育。三是考试招生制度严重不公。特别是表现在名校省际配额制度上、表现在高考招生标准不统一的制度上等等。北大、清华每年在北京地区的招生名额往往等于几个省的总和，一个江西户口的学生要上北大，高考分数却要比北京户口的学生多几十分甚至一二百分。

阿里研究院报告：当前中国面临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教育不公（学者们把“教育公平”分为三个层次：受教育的机会公平、质量公平、使得受教育的效果公平）。第二，创新不足，脱离现实。第三，难以达到终身教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提出了“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

消除歧视，建立公平，当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如何实现教育公平，任重而道远。

在中国这个紧张的考试月，本期推出专题“教育公平”，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教育公平是永恒主题

核心提示：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本研究案例国和国际组织在最近的教育发展规划或教育战略计划中，多数都把提高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技能培训成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教育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培养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人

研究发现，本研究部分案例国和国际组织在最新的教育发展规划或教育战略计划中，都强调教育为未来发展准备。例如，日本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13—2017）提出四大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培养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引领与创造新价值、新观念的领导能力和领军人才。

再如，芬兰在《教育与研究发展规划 2011—2016》等文件中提出，基础教育未来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培养未来公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包括思考能力、自我掌控意识与责任意识、动手与表达能力、参与与动员能力、工作与交往能力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教育战略 2014—2024》中把“塑造未来教育议程”作为其三大战略目标之一。世界银行在《2020 教育战略》中将全民学习

作为其未来的核心目标。

提高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本研究案例国和国际组织在最近的教育发展规划或教育战略计划中，多数都把提高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例如，美国教育部在其《2014—2018 教育战略计划》中将“公平”作为其未来 5 年的六大战略目标之一，其基本的内容包括提高缺少关怀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减少歧视，以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好成功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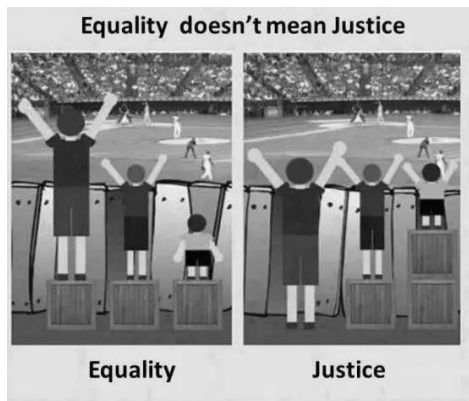
日本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 8 项使命，其中之一为“确保有学习意愿者的学习机会”，要求保障所有学习者拥有不受经济状况影响的平等学习机会，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学力的影响，为学习困难学生、年轻人提供重新学习机会。

印度“十二五”教育规划中提出的基础教育发展战略之一是采取特别措施推进义务教育公平，保证儿童正常出勤，有效解决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中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提出，增加经济发展落后乡镇弱势群体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之一是运用新的技术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效率，扩大机会。加大对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投入。

法国《重建共和国基础教育规划法》要求基础教育在未来 5 年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让所有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后所有学生能达到“共同基石”要求的能力标准，高中会考通过率达到 80% 以上。第二，缩小因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不同而产生（下转第 5 页）

刘瑜：如何最大程度地确保教育公平

从美国教育平权谈起



在考虑无知之幕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来,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这一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

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

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

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民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

“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

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

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



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

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

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2016年5月21日每日头条)

(上接第1页)的不平等,打造让所有人成功的新教育。第三,减少肄业学生的数量,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功率,将未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人数减少一半。

重视技能培训

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技能培训成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教育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例如,俄罗斯在《2013—2020年俄罗斯教育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保证俄罗斯经济对于优先发展领域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要为所有公民终身获得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技能以及再培训创造条件。

日本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将“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核心专门人才和高端职业人才”列为30项核心措施之一。

美国教育部《战略计划2014—2018》提出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增加急需和高技能领域的学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教育战略2014—2024》中提出要加强技能开发,具体包括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提供政策支持,实施技能开发项目,加强国

际合作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政府的“技能战略”项目。OECD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帮助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改善教育和培训机构对市场需要的灵敏性、提高学习供应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学习供应的灵活性、促进技能的转换性、增强进入学习及培训机构的便利性,以及保证重新进入学习及培训机构的低成本。

重视学前教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从所选的案例来看,多数都强调加强学前教育。例如,美国教育部在其《战略计划2014—2018》提出提高所有出生到三年级儿童的健康、社会情感和认知水平,以使所有的儿童,特别是那些急需的儿童做好毕业和就业准备。

为此,美国教育部计划增加高质量早期学习项目和综合服务,提高早期学习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提高州早期学习项目的水平并实施早期学习综合评价。日本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中提出的30条举措中,其中一条便是“加强幼儿教育”。

(中国教育报)



吴德刚：从机制上保证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就其本质上讲,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公平,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克服由于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宗教等差异给个体受教育者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受到最基本的教育。为了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

一、公共参与机制

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对于教育公平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加速器”。社会的参与能够广泛地调动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乃至支持,从而促进教育机会的不断扩大并教育公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二、社会的参与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在广泛的参与中,社会各界必定会提出更多更好的教育改革建议和思想,有利于教育改革的进行并推动教育公平。

第三、社会参与充分体现了教育民主的精神,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教育的良好风气。近年来,社会的参与也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推进逐步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

社会参与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大到管理的参与、经费投入的参与、战略决策的参与,小到教学过程的参与,如办什么学校,招收哪些人入学,聘任什么样的人做教师,如何筹措和配置教育资金以及学校教育如何进行改革等等。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将更为高涨,也将极大地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平等的实践。

二、法制保障机制

教育法制是建立教育公平机制的根本环节,是维护教育公平已有成果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通过立法程序,把国家关于扩大教育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实现目标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和整个社会所遵循的准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最有效措施。

当前必须重视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有关教育公平的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限定能够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次,关于教育公平的教育法律与法规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法律与法规的存在和效力要不以政府机构的改组和人事更迭为转移。而且有关教育公平的法律与法规要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再次,教育立法还要重视其可操作性和严肃性。

三、均衡发展机制

考察我国教育公平的现状,农村义务教育、幼儿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残疾儿童教育、扫盲教育等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教育机会平等的最重要方面,关系到人生起点的公平。完善我国义务教育制度,当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将免费制提到议事日程。免费制是世界多数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由于

历史的原因,我国尚未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这必将影响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程度,也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的实现。

第二,要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发展幼儿教育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促进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措施之一,许多国家将发展幼儿教育看作是消除不同阶段、阶层和家庭文化差异,尽早实现教育机会起点上平等的重要途径和补偿性措施。我国幼儿教育比较滞后,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教育非常薄弱。

第三,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亿。普及少数民族教育是当前教育公平制度建设重点和难点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关注和抓好特殊儿童教育。残疾儿童入学率,可以充分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保障女性受教育权利。男女性别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教育公平的难点。即使在非常发达的国家,妇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仍然没有保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女性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仍然存在,这在建立教育公平制度实践中必须予以重视。

第六,要加强农村教育。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范围最广泛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教育不公平的突出反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深刻地指出:“农村地区教育服务不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我国有近80%的人口在农村,文盲中的绝大多数也在农村。要改善有着八亿人口的农村的教育条件,还有待于整个社会所有人们的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四、政策导向机制

教育政策及其组织和实施直接影响教育公平。国际教育局在第三十七届国际教育会议上,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将“改进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管理,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以便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世界银行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最大

的失误是决策失误。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建立教育政策导向机制,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要实行教育经费倾斜政策。基础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它对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同时,它又是发展其它各类各级专门教育的基础。因此,在经费的配置上,必须保证基础教育的重心地位。由于我国经济还不发达,教育的总投入是有限的,从这一实际考虑,国家在经费投入的总量配置上,应以保证青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国民基础教育为主。同时兼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择优培养的原则,适当发展高等教育。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政策,坚持科学命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改革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就业制度,建立相对公平的毕业生就业的机制,打破地区与身份限制,营造公平用人的社会环境。

第三,是要重视教育内容的改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发展,无论城乡中小学校还是各级专业院校,既要加强现代学科新知识的教学,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平意识,这是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对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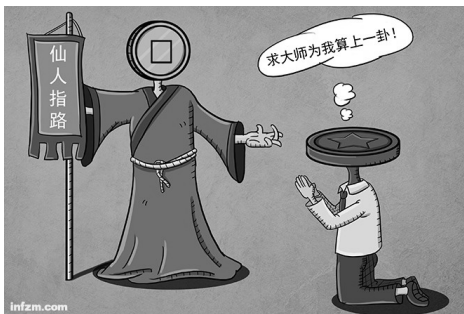
第四,要规范教育收费,坚决制止各种形式的乱收费。“乱收费”与教育机会平等的精神是相悖的,如果听之任之,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不控制这一现象,必然会影响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平等的进程。

第五,坚持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延缓课程分流时间,尽可能使所有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技巧以及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这是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长远措施。

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平等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2016年6月2日 学习时报)

“前些年求升迁，近几年求稳定” “迷信”官员迷什么、信什么



“说官员迷信，不如说他们迷恋权力，与正统的宗教信仰无关。”
(东方 IC/图)

“谢清纯每到所谓的观音生日，他必一天吃斋。到后来，每天出行都要算一卦，看看往什么方向走吉利。”

有学者调查显示，“76.53%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23.47%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或迷信行为。”

“说官员迷信，不如说他们迷恋权力，与正统的宗教信仰无关。”

2016年1月以来，中纪委通报多名官员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近期一个调查报告显示，“本次调查中有76.53%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23.47%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或迷信行为。”讲迷信、信风水，在中国官员群体中已不再是个别人的问题。

官员迷信将以违纪论处

“自从信佛后，只看佛书，每年必到四大佛教名山拜一遭，每到所谓的观音‘生日’，他必一天吃斋，

甚至到后来，每天出行都要算一卦，看看往什么方向走‘吉利’。”2016年4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已落马的湖南省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时称。

谢清纯的这种迷信程度，被纪检监察部门认为是“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与谢清纯有相同“爱好”的官员，还大有人在。4月21日，中纪委通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被“双开”，中间就提到龚清概“搞迷信活动”。4月18日落马的广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志庚被通报，同样存在“长期搞迷信活动”。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2016年以来中纪委通报的存在参与迷信活动的落马官员还有太原市阳曲县委书记吕荣、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栋梁、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邓崎琳等人。

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过去，“组织、参加迷信活动”并未被列入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之中，但这类官员并不少。

2013年，纪委调查组对江西省安远县原县委书记邝光华采取强制措施后，依程序检查其随身物品时，竟发现其身上“求神避邪”的符、钱类东西有六七样之多。

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刘志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志军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刘志军都会请“大师”来选择黄道吉日。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4年4月29日被“双开”。在中纪委的通报中,就有“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的表述。

南方周末2014年5月曾报道,李春城落马之后,青城山一位姓高的风水师因牵涉李案,也被调查。李春城还与一位名叫曹永正的“大师”交往密切。

2014年5月被纪委立案调查的广东河源市原科技局局长黄胤胤迷信风水,分别在河源市连平县陂头镇、惠州市博罗县大坝镇建造风水屋以及河源市区长鸿花园的居所专门设一间风水室,以求官运亨通。

2015年11月落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雪山主政吴中市期间,担心影响风水,在吴中市政府大楼及其配套工程建设中,经常检查工地、改动图纸。其中,广场的喷泉至少改建过3次。每次喷泉刚刚建成喷水,他都讲很好。而后没过几天,他就要求拆了重建。

部分官员“基本科学素质”偏低

各种关于官员迷信的信息,在官员们落马前一般在坊间流传。

湖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他观察,“官员迷信现象似乎并不普遍,都是经过媒体报道才知道一些官员信迷信。迷信是比较隐私的一件事,一般情况下彼此不会讲。”

山西一名地级市市委书记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因交通需要,该市市委门前的路由过去的双向行驶改为了单向行驶。有官员私下向他建议,其前两任市委书记都当了省委常委,他接任后改路破坏了风水,最好把路改回双向。

他说,他并不信,但有些官员信。那么,到底有

多少官员迷信呢?

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曾发布“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称“过半县处级官员都相信迷信”,曾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程萍当时以东中西部地区的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为样本,得出结论:52.4%的县处级官员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的做法。

2014年10至11月,长期关注官员迷信现象的程萍重新做了一次针对官员科学素养问题的调查研究,发现官员迷信的现象比前几年“有一些好转”。

在这个题为《“十三五”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发展规划研究》的调研报告中,程萍透露这次调查的样本是300名厅处级官员,调查方式是问卷调查,最后288人提交了调查问卷,277份问卷有效,其中厅级公务员占73.29%;县处级占20.94%。

“结果显示,76.53%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23.47%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或迷信行为。”程萍在调查报告中称,2006年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的只有47.6%,这一次比例提高了28.93个百分点。

那么,迷信的官员信的是哪些呢?

程萍的调查发现,“我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的人数比例为第一,占12.63%;相信‘求签’的人数比例居第二,为7.58%;相信‘星座预测’的人数比例第三,为6.14%;相信‘周公解梦’的人数比例为第四,占5.05%;相信‘电脑算命’的为1.80%。”

报告中的另一项数据显示,“我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6.97%”。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研究报告的300名样本官员中,95.3%的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就占到了40.07%。

程萍和官员打交道的机会不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时候和官员们一起开会,期间会组织一些考察,有些官员知道我是做这个研究的,会避开我,要到寺庙里去拜上几拜。”

贪污腐败和迷信有因果关系

迷信,在每个官员那里都有不同的诉求。

2014年11月,福建省龙岩市旅游局原副局长范甲荣因涉嫌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刚被组织调查时却大声叹息:“在寺庙求签说我有一个坎,果不其然!”

临汾市纪委处级官员汪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临汾市原文物局局长常引根在“双规”期间还要算日子、讲风水,在特殊的日子拒绝接受纪委谈话,“他信风水,阴历初一、十五就不配合问话。他说,‘这几天我什么都不会说,过了这几天我什么都说。’”

一位长期在中部某省会城市活动的“风水大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官员向他讨求风水的现象非常普遍,他的客户中有20%左右是各色官员。

“大师”介绍,曾有一位官员因挑选别墅房有求于他,“大师”在实地“勘测”时,发现官员挑选的别墅门前,一个尚未安装的指示牌横放在地上。“大师”认为这是不好的兆头,劝这位官员不要购买这套别墅。于是,这位官员购买了另一套本来没看中的别墅。

采访时,“大师”反复强调,“我认为风水并不是迷信。”这位“大师”还自称他是众多政府、企业的风水、用人甄别、事件决策顾问。

南京玄奘寺方丈释传真曾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与多名已经落马的南京官员都打过交道。南京一名副市长的女儿结婚,就是找他选的日子。

“大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官员相信风水由来已久,只不过“这几年多了些”,需求也有所变化,“前些年是求升迁,近年是求稳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高压反腐让腐败官员有种恐惧感,不知道纪委掌不掌握他的材料。”

在程萍看来,贪污腐败和迷信有因果关系。“对腐败官员来说,由于国家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在获得非法物质利益时的另一个主要诉求。腐败官员有很强的侥幸心理,也就有很强的迷信动机,希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使自己逃脱惩处。”

“说官员迷信,不如说他们迷恋权力”

2015年9月接受调查的辽宁省抚顺市市长栾庆伟,曾写自悔书对迷信“大师”进行自我反省。

辽宁省纪委向媒体透露,2007年开始,栾庆伟见过的几个“大师”都说他的命很好,一生官运亨通。2015年开始,栾庆伟听到调查他的传言,在接受调查前几天还和一个著名的“大师”见面。“大师”告诉他:“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分手后,“大师”还发信息告诉他:“确实没有问题,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

落马后,栾庆伟在悔过书中写道:“难道这叫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这叫真的有惊无险吗?现在看来,搞封建迷信,相信大师是何等愚蠢!”

“迷信,就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栾庆伟说。

2013年10月底,河北省大名县县委书记边飞被调查。清点随身物品时,3个小红布包引起了审查人员的注意。拆开红布包,里面是画着符咒的黄纸,仔细辨认,依稀认出“蒲志安永久绝败”“保佑边飞化恶呈祥”等字句。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蒲志安曾任永年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4次送给边飞4张银行卡,共计45万元。2011年底,蒲志安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边飞担心被牵连出来,便找“高人”给他念咒画符保佑。

任建明认为,很多官员迷信的动机是预测升迁,由于人事信息敏感,组织纪律要求又很高,这些官员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

任建明的判断,与太原龙泉寺住持恒峰接近。恒峰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一些官员迷信,反映了官场上的不确定性。”

程萍在与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干得好,不如吹得好’等官场潜规则则暗地起作用。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迷茫感,把升迁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

“说官员迷信,不如说他们迷恋权力,与正统的宗教信仰无关。”恒峰说。

(2016-05-19 南方周末 褚朝新 张笛扬)

周其仁：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和下一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根据2016年4月15日作者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整理。

城市化是一种人口现象，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人口结构变化，还有空间结构的变化，因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不仅是自然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农村人口不断位移的结果。

什么是城市的定义呢？城市的概念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达，但每个国家的城市都是用密度来定义的。当一个地区的人口和其他资源的集聚超过一定密度（具体标准各国并不统一），这个地区就成为了城市。城市化就是更多人口从低密度空间迁移到高密度空间的进程。那么，人口迁移的动力在哪里？为什么农村人口要往城市移动？为何这样的迁移趋势与经济增长趋势一致？这样的进程什么时候会加速，什么时候会停滞、甚至走到了终点？

人口之所以不断迁移，在经济学家看来，是为了生产和生活，最终是为了提高国民财富。不同的经济活动，会形成不同的集聚和不同的人口密度。传统的农业活动，不太可能支持高密度的人口集聚；直到制造业等工业活动大规模发展起来以后，人口密度才开始变大，因为这些活动是知识密集型的经济活动，支持小范围内大量的产出。只有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城市化的规模才开始大为不同，各种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和高科技领域才开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正是不同的经济活动导致了

不同的人口集聚和人口密度。

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人口流动和集聚促进了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立国。底层是庞大的农业活动和集市，上层是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这种文明和传统导致了传统中国的人口分布。根据学者赵冈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16%，而到了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到了1957年达到了15.4%。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城市化率没有显著提高，因为过去两千年中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一般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很大的城市。

所谓现代化大都市的概念，不是从我国古代城市的体系里产生的。农业文明与城市化的联系比较弱，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加速以后，城市化进程也会加速。我国195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也验证了这个道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1959年我国城镇化率比1978年还略高一些。“文革”以后，我国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判断是，工业化指数超前，城市化指数滞后，工业附加值占整个国民经济附加值约45%，但城市化率很低，不到20%。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公民没有迁徙自由权。因此，各项改革在1980年代逐步启动，我国人口的自由流动就此开启。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3亿，占总人口17%。

人口的流动和集聚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那么这些人口流动到了哪些城市呢？根据统计数据，流动人口中将近79%集中在东部地区，80%在大中城市，44.1%到了大中城市中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和直辖市。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期间，北京人口增长了41%，上海人口增长了37.5%，



天津人口增长了 29.3%，同期全国平均城镇人口增长了 5.8%。可见一些城市的集聚程度加速，另外一些城市却留不住人。按照全球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平均比例来看，我国城市化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只有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趋同的时候，人口迁移的过程才会结束。

中国城市化的下一程：建设“紧凑型城市”

城市里人口的集聚带来需求的集中、分工的深化、信息传输成本的降低等，人们相互服务就能成为一个大的产业。城市的意义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城市的结构、人口的密集和人们之间思想的碰撞。

人口的经济活动为何要集聚在大城市，而不是其他地方？以纽约曼哈顿为例，面积不到 70 平方公里，2010 年每平方公里产出 GDP 是 16 亿美元。曼哈顿是由 240 多条街道和 8-9 条大道组成的格子化的城市形态，街道和街道之间的距离只有 100 米左右，每条马路都很窄，但是在这样格子式的街区里面生活非常便利，因为里面商业资源和服务业资源非常丰富。反观我国的城市，基本上每一个街区都很大，每一条马路都很宽，但仍然无法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城市道路有多宽，而是城市道路是否密集、城市的结构是否紧凑。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发展的误区就在于，总是盲目追求城市水平空间的扩大和蔓延。根据国家发改委小城市中心 2014 年的报告，全国 144 个地级市中 133 个提出要建新城区；161 个县级市中 67 个提出要建新城区，而且往往规划中的新城区要比老城区大得多。我们总是误以为这样才是城市化。数据还显示，2009 年到 2013 年间，我国城市建设的新城区面积为 1 万

平方公里，相当于 50 个洛阳城。但是这些城市的密度怎样呢？目前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所谓“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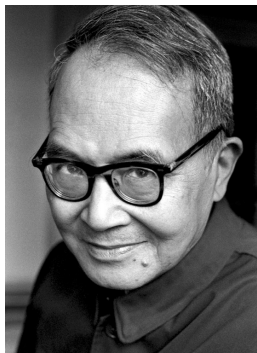
我国提出要实现“以人中心”的城市化，但现在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当中有两大问题：一是人们想去的一些特大城市缺乏人口承载力，二是人们不太愿意去的一些中小城市在大搞建设。我认为，我国城市化的下一程，就是要提升每座城市的密度，把人气和经济活动组织起来，然后再考虑城市空间的延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中小城市都要进行“摊大饼”式的建设。“摊大饼”是传统农业文明的空间观，但是工业化以后的城市化不需要占用太多土地。此外，“摊大饼”式城市发展观也受到“土地财政”的影响，因为政府要靠卖地才能取得出让金。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外需不振，而最大的内需就是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的观念和机制不对，那么内需也很难持续。很多地方是用债务来建设新城区，如果新城区没有人气，没有投资回报，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无论大中小城市，提升它的密度。我曾去日本考察过一座“紧凑型城市”，由于这个城市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他们为了老年人的便利才设计了这样的城市。虽然城市面积不大，但通过开设适合老年人乘坐的地面电车系统（采用 PPP 的模式来运营），把城市里主要的居民点、消费场所等地段连接在一起，然后再通过刺激和倾斜政策鼓励大家搬到离地面电车系统较近的地点居住，现在这个城市的运营非常成功。从日本的经验看，只有搞“紧凑型城市”，城市才会有活力，居民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才会增加。

因此，城市不应该是低密度的，这样的城市可能绿化很好，但是人气不够。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中，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补齐了过去农业社会的短板；中国城市化的下一程中，要解决过去遗留的观念问题，拒绝“摊大饼”式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未来我们的城市应该把人气聚拢起来，把经济活动组织起来，让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积极活泼的城市文明。

（2016 年 5 月 24 日人民论坛网）

钱钟书与“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的交往



【摘要】胡乔木：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自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钱钟书是胡乔木的清华大学同学。但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们仨》，内中写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

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的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照，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

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据邓绍基先生回忆，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著名学者的关心。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曾经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李副主席：

社会科学院有3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胡乔木（签名）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下转第20页）

大师离去后，他们的藏书去了哪儿



葛剑雄，浙江湖州人，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

导读

谭其骧先生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里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发霉生虫。先师生前经常感叹，要是没有放书的地方，何至于有几部好书会失之交臂？

文人学者的藏书来之不易。季龙先师（谭其骧）的看法，一是要有钱，一是要有闲，还得有房。

抗战前在北平，他不过是以课时计酬的讲师，已经有三家书铺送书上门，需要的留下，每年到三节时结账，不需要的到时还可退回。那时一节课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板不担心你付不起书款。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担任“专任教授”（专任教授薪水

高，但一人不能在两校当专任，在暨南只能用谭季龙的名字），两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糊口，哪里还有钱买书？上世纪50年代初苏州古旧书源丰富，价格便宜，顾颉刚先生经常带章丹枫（章巽）先生去苏州淘书，章先生大有收获。先师也想去，却经常忙于教务与研究，以后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更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了。

抗战前先师已经积累了一批藏书，成家后租了一处大房子，完全放得下。1940年去贵州应浙江大学之聘时，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间，只能将大部分书寄放在亲戚许宝骅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复旦大学后，藏书又不断增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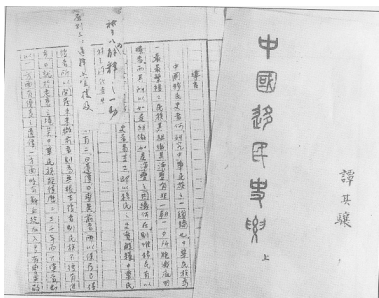
管 1956 年分到了最高规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间房间和独用的厨房、卫生间，还是赶不上藏书增加的速度。文革期间住房被紧缩，1979 年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会客室兼书房，只见书架上、写字台上、沙发旁和茶几上到处是书，稍有空隙处都塞满了杂志，有时要找一本书还得到卧室去找。

1980 年上海市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师迁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三间住房合计 59 平方米，住着一家三代、一位亲戚和保姆共七口。他将最大的一间用书橱一分为二，里面约 10 平方米作他的书房兼卧室，外面的 14 平方米作会客室并放书橱，晚上还要供家人睡觉。另外两个房间包括儿媳的卧室也都放着他的书。但书不能不增加，他家不得已已在阳台与围墙间小院内搭了一间小屋，放了 10 个书架。

这小屋自然属违章建筑，也挡住了邻居院内的阳光，引起邻居不满，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先师无奈，除亲自登门道歉外，又将屋面拆至围墙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来。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里阴暗潮湿，闷热难当，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发霉生虫，粘连成团。先师生前经常感叹，要是没有放书的地方，何至于有几部好书会失之交臂？

其实，藏书还得有另一个条件——贤内助，先师虽未直说，在当他助手这十多年间我了解不少。先师在遵义时的助手吕东明先生生前告诉我，师母在与先师发生争执时，经常会拿他的书出气，甚至直接扔在门前河中。我不止一次听师母抱怨先师的钱都拿去买了书，弄得家里开销不够。其实先师买书大多是花工资以外的稿费收入，但在师母面前也得运用模糊数学。

有一次与顾颉刚先生的助手谈及，才知道我们的太老师有相同遭遇，太师母甚至管得更紧。顾先生购书不仅得动用小金库，而且还不将大部头的书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为零，以免引起太师母注意后查问购书款的来历。



顾颉刚先生与夫人张静秋

先师从来不把自己的书当藏书，只是工作用书，少数与专业无关的书也是为了“好玩”。他一直说：“除了那部明版《水经注》，我没有值钱的书，不像章丹枫的书。”有的书买重复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会将富余的书送掉。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游记》，他将原来的一部送给我。有了《读史方輿纪要》的点校本，就将原有的石印缩印本给了我。他自己留的讲义、抽印本、论著，只要还有复本，也会毫无保留地送给需要的人。得知我准备撰写《中国移民史》，他就将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学毕业论文手稿送给我。这份手稿封面上有周一良先生的题签，里面有不少导师潘光旦先生用红笔写的批条，中文中夹着英文，是一份珍贵的遗物，我将其归入本所已经设置的“谭其驥文库”。中华书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他觉得此书重要，以前历史地理学界重视不够，专门向出版社买了几本送给我们。



谭其驥先生在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毕业时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先师的藏书中有半部六册《徐霞客游记》，那

还是抗战前在北平时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送给他的。封面有邓先生的题识：“《徐霞客游记》季会明原本。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册（九、十分上下），其七阙原。一至五册昔在刘翰怡家，若得合并，信天壤间第一珍本也。”70年代末，先师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即将此书交给参与整理的吴应寿先生，供出版社无偿使用。正是以邓先生的题识为线索，几经周折，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曾为嘉业堂收藏的五册季会明抄本。经赵万里先生等鉴定，这就是当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给钱谦益、又由钱推荐给汲古阁主人毛晋的《游记》残本，这部湮没了三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终于重见天日。与长期流传的乾隆、嘉庆年间的刊本相比，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字数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游记多了156天（原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师将这六册书送给邓之诚之子邓珂，建议他将此书出让给北京图书馆，使两部残本合璧。王锺翰先生得知此事，颇不以为然，问先师：“这是邓先生送给你的，为什么要还给他儿子？他儿子没有用，无非是卖几个钱。”先师答道：“邓先生送给我，是供我使用的。现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这套抄本了，应该物归原主。如果真能由北京图书馆配全，不是更好吗？”不过，邓珂是否接受先师的建议，这几册书究竟能否与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应召去先师家，他郑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后事，其中就包括对他藏书的处理。他说凡是所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书可全部挑走，作为他的捐赠，剩下的书卖掉，所得由子女均分。1992年8月28日零时45分，先师在华东医院病逝。1时20分，我在先师的遗体旁向他的长子转达了先师的几点遗嘱。

以后他的子女找我商量这些书的处理办法，因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决定不向复旦捐书，但可以让邹逸麟（时任所长）、周振鹤（先师学生，我同届师兄）和我挑些书留作纪念。我当场表示，先师

留给我们的纪念够多了，不需要再挑书，同时说明如这些书出售，我们三人都不会购买，复旦也不会买，以减少双方的麻烦。据我所知，他们曾请人估过价，打听过卖给外国机构的可能性，还接洽过几家机构，商谈过捐赠条件，但都没有成功。



谭其骧先生与同事们，左起：吴应寿、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周维衍

几年后，我已担任研究所所长，先师子女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将先师的藏书捐赠给复旦大学，同时捐赠先师的手稿、日记、书信、证书等全部文件，条件是学校必须完整收藏，妥善保存。我立即向校方申报，提出具体条件，还建议发给家属20万元奖金，由学校与本所各筹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批准。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这一半奖金拖了好几年才发出。学校图书馆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编目入账后，将其中的古籍和专业书籍、刊物拨归本所集中收藏。由于先师家那个小间保存条件太差，又没有及时清理，放在那里的不少书已霉烂损坏，只好报废。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前，光华楼建成启用，我们在西楼21层本所最大的一间（80平方米）设立“谭其骧文库”，除了收藏先师的书籍、文件、纪念物外，还集中了所里收集到的先师遗物，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资料、内部出版物和用品。

央视、凤凰卫视和上海电视台等曾先后就先师的生平、贡献和我们的师生关系采访过我，我都将拍摄地点放在这里。每当我谈及先师的学术贡献和嘉言懿行，追忆他树立的人格典范，重温他的教诲，经常禁不住会凝视他留下的遗产，抬头仰望他慈祥的遗容，总觉得我就在他身旁。（腾讯大家 2016-05-26）

鲁迅去世，蒋介石有没有送花圈

笔者翻查了此一时期在上海影响力很大的《申报》，并无一字提及蒋介石发唁电，或送来挽联、花圈等。



近年来，蒋介石向鲁迅敬献花圈之说广为流传

近年来，网络上广泛流传一种说法：鲁迅生前虽长期批评国民政府，但从未指名道姓骂过蒋介石。故而，当鲁迅于1936年10月去世时，蒋介石以个人名义，向鲁迅敬献了花圈。

这是真的吗？

据周建人披露，鲁迅确实不答应用真名写文章骂蒋介石

鲁迅不愿骂蒋介石，确实有迹可寻。鲁迅生前，曾拒绝过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的要求。时为1930年5月7日，鲁迅由冯雪峰陪同，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在上海爵禄饭店秘密见面。①至1977年，鲁迅之弟周建人，刊文披露此次会面的部分谈话内容：

“鲁迅同我讲过他见过一次李立三。他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是个知

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②



鲁迅

但目前还没有材料，能证实蒋介石向鲁迅敬献了花圈

1、《申报》关于鲁迅去世的报道中，只字未提蒋介石发唁电、赠挽联、献花圈

至于蒋介石向鲁迅敬献花圈一事，则尚无材料可以证实。

鲁迅在上海去世，时为1936年10月19日，10月22日出殡。笔者翻查了此一时期在上海影响

力很大的《申报》。自10月20日报道鲁迅去世，至23日报道鲁迅出殡，期间《申报》多次提及致祭的名流，如21日报道称灵堂内有“日人内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多少将，沈燕冰等的巨大的花圈”，蔡元培、曹聚仁、唐弢等送了挽联；22日报道称上海银行界名流王晓籁等送了挽联。但并无一字提及蒋介石发来唁电，或送来挽联、花圈等。^③

以蒋介石当日的身份地位，如果送了花圈，《申报》这种本地大报，不可能漏掉这种大新闻。



《申报》1936年10月20日关于鲁迅去世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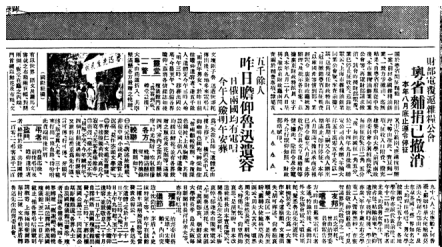
2、茅盾在鲁迅丧仪纪念册里看到了孔祥熙的名字，但没看到蒋介石的名字

作家茅盾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据他回忆，他在鲁迅丧仪纪念册里，曾见到过孔祥熙和王晓籁的名字：

“鲁迅逝世时，我在乌镇探望母亲。……痔疮正大出血，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四五天后，稍微好些，我就挣扎着赶回上海，可是鲁迅的丧事已经办好了。……当时，我也是治丧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们送了我一本记载鲁迅丧仪的纪念册，那里面刊载着致送挽文和挽联的内容和人名，其中居然还有孔祥熙和王晓籁的名字。那时瞻仰遗容整整三天，全市轰动，去瞻仰的人犹如潮涌。报上连日刊载某某大明星之类也去瞻仰遗容等报道。鲁迅曾说过：死人给活人出风头。想不到在他自己死后，竟给各式人等出足了风头。”^④

茅盾嘲讽孔祥熙和王晓籁赠送挽联，是借死人出风头。如果丧仪纪念册里有蒋介石的名字，想必也逃不掉被嘲讽的命运。茅盾没有提，显然是因为

纪念册里并没有，他没有看到。



《申报》1936年10月21日关于吊唁鲁迅的报道

3、中共将葬礼“搞成一个运动”来向国民政府施压，蒋介石不太可能献花圈表示屈服

不光孔祥熙送了挽联，23日的送葬队伍里，还有孔祥熙之妻宋霭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孔祥熙和宋霭龄，是宋庆龄利用亲属关系动员来的，目的是“给鲁迅丧仪的浓厚政治色彩以某种程度的掩护，以便减少国民党公开镇压的可能性”。^⑤此说恐难成立。一者，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曾计划镇压鲁迅的治丧活动；二者，即便当局想要镇压，有宋庆龄、蔡元培等名流参与主持丧事，也并不需要宋霭龄的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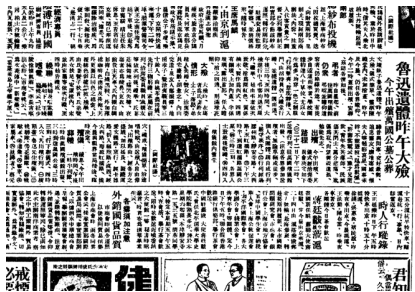
不过呢，鲁迅的葬礼，确实并非一场单纯的葬礼。鲁迅去世当天，地下党人冯雪峰即“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找到宋庆龄，请她出面“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最终办成了一场“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据夏衍讲，当时地下党人连夜组织了一支六七千人的送殡队伍，随灵车沿途高呼政治口号。保安（当时还未迁至延安）方面，则以“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的语气，要求南京方面给予鲁迅国葬待遇，改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⑥这样的政治对抗氛围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太可能“示弱”、“就范”，去向鲁迅敬献花圈。

4、南京的宣传方针，对鲁迅肯定一半否定一半，蒋介石不太可能破坏政策去献花圈

此外，针对鲁迅的去世，国民政府在宣传上有过指示（也算是一种评价），既非全盘肯定，也非全盘否定：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卅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⑦

不难想见，蒋介石如果去向鲁迅敬献花圈，无疑会致上述宣传政策进退失据。



《申报》1936年10月22日关于鲁迅葬礼的报道

注释

①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P992。②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事》，《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5期。收录于《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P119。③《申报》，1936年10月19日至24日。灵堂内有“日人内山完造，以及日本武官喜多少将，沈燕冰等的巨大的花圈”之信息，出自《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先生遗体》，《申报》1936年10月21日“本埠增刊”第二版。其余具体报道不再赘注。④金韵琴，《茅盾晚年谈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P50。⑤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P228-229。⑥王彬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收录于《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P179-193。⑦季樟桂，《写鲁迅的诗及其他》，收录于《上海鲁迅研究2009（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P262-265。

（腾讯 短史记 2016-05-30 第501期）

（上接第14页）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社科院的另一位副院长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这位副院长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传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人民网[微博] 2016-05-26）